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中的 “一带一路”倡议

——基于亚洲秩序变迁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经验的反思*

付宇珩 李一平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资本积累的无限性与民族国家主权边界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难以在霸权主导下通过开辟高利润、低成本的资本积累空间来克服。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它在亚洲集中体现为经济结构与安全结构的脱节。世界帝国的历史遗产和独特的现代国家构建经验，使亚洲成为决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未来变迁趋势的关键因素。中国无论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还是在资本主义时代，都自成相对独立的世界体系，而不只是抽象的政治实体。这赋予了中国通过内部变革影响体系变迁的大国能力，同时也塑造了其根深蒂固的国家脆弱性。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实质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构。中国如果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与国家治理能力不足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摆脱国家脆弱性的束缚，就必须依托于新的世界体系，而不能局限于对陷入结构性危机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技术上的修补。“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具有世界体系构建意义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战略，它试图将中国的内部变革与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整合起来，最终发展出不同于霸权更替的体系变迁可能。

关键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 世界帝国 “亚洲悖论”
中国现代国家构建 “一带一路”倡议

作者简介：付宇珩，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访问学者；
李一平，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一带一路与东南亚研究院教授

* 本文得到福建省委宣传部委托专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印尼、马来西亚及菲律宾经贸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重大研究课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人文交流研究”的资助。感谢《当代亚太》杂志约请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一、问题的提出

冷战的结束对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①在后冷战时代，国家，尤其是非西方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体系层次的变革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霸权周期性更替是否还能够顺利实现？它作为维持现代国际体系结构稳定的关键机制是否依然有效？新的世界秩序应当建立在什么样的结构基础上？这些问题成为推动国际关系理论构建乃至广义的政治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然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难以摆脱西方经验^②的束缚，面对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以及由此产生的世界秩序重构的压力，它们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与预测力。尽管不少学者指出，国际关系学界长期坚持的无政府状态假设并不符合历史与现实，因为等级秩序普遍存在于国内政治与国际体系，权力转移和霸权更替才是国际体系的常态，^③但是，权力转移理论和霸权稳定论实际上却将等级秩序的反复出现与霸权周期性更替视为体系稳定的必要条件和体系变迁的唯一可能的趋势。这是因为，它们都坚持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假设，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民族国家体系是永恒的，并且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内容，进而认为西方世界的工业化与民族国家构建的经验，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行为模式具有高度的一般性。因此，它们都难以发现非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和整个国际体系突变

① 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3, Winter 1992-1993, pp 5-58; William C. Wohlforth, “Reality Check: Revis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Response 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orld Politics*, Vol 50, Issue 4, 1998, pp 650-680.

② 例如，布赞（Barry Buzan）和利特尔（Richard Little）尖锐地指出，国际关系研究深受现代主义（presentism）、非历史主义（ahistoricism）、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无政府偏好（anarchophilia）和国家中心主义（state-centrism）五种解释路径的束缚。参见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刘德斌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9页。

③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8; George Modelski, “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0, Issue 2, 1978, pp 214-235;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与进化的可能性。中国正全力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植根于亚洲地区秩序的丰富历史遗产，以及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经验。不可否认，这些历史遗产与历史经验中有类似于西方世界权力转移和霸权更替的内容，因为权力支配关系塑造了人类社会的一般性政治逻辑。然而，这些历史遗产与历史经验的相对独立性也塑造了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世界秩序观与战略行为，从而可能产生更加平稳有序的权力转移方式，以及更加平等包容的世界秩序形式。

冷战结束以来，将中国视为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者或霸权继任者的理论不断推陈出新。如果依据“持剑经商，战争立国，国强必霸”的西方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经验来思考中国未来的战略选择，必然会证实这些理论对中国战略意图和行为倾向的假设，从而使中国可能尚未真正崛起，就会成为众矢之的。^①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根据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权力转移与霸权转移理论，来思考中国未来的战略选择和制定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措施，极有可能导致中国与西方国家发生直接对抗，并且引发非西方中小国家的疑虑。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是否应当沿袭西方经验去追求霸权地位，而在于霸权更替对于维持国际体系结构稳定是否依然有效，以及中国是否还具有通过西方经验指导下的民族国家构建，成为下一任全球霸权的客观条件。不可否认，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的遵守，尤其是对美国霸权的承认。然而，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上升，中美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不仅没有产生相应水平的政治互信与安全合作，两国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甚至有激化的可能。与此同时，亚太地区的经济相互依赖和政治不信任并存，经济合作机制碎片化严重，甚至相互抵触，从而逐渐成

^① 关于西方民族国家构建的研究，参见 Anthony 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5;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2;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0。

为大国斗争和中小国家对冲风险的工具。^①例如，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曾经呼吁打破“亚洲悖论”，即安全风险与经济相互依赖并存的局面。^②但她后来却在“萨德”问题上不惜牺牲与中国日益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来换取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此外，南海局势的升温与复杂化虽然与域外国家的介入有关，但也充分暴露出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政治不信任，以及中国传统经济外交的局限性。上述现象表明，美国霸权曾经为亚洲创造的稳定是不可持续的，亚太地区权力分裂的趋势强于权力转移的趋势，即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自主主导地区乃至全球秩序。有学者认为，传统的均势理论和霸权理论都难以解释东亚地区秩序的变迁。^③为了摆脱当前国际关系理论脱离实际的困境，不少学者主张将理论构建与历史研究和区域研究结合起来，尤其要重新审视非西方世界的历史经验及其对理论创新的意义。^④实际上，为了增强体系层次的宏观理论的解释力与预测力，重新重视对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研究，

① Kai He, *Institutionalizing Security, Institutional Realism and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in Southeast Asia*, Ph.D. dissertation,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May 2007;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4, No. 3, 2008, pp. 489-518;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6~32页。

② 《朴槿惠：东北亚出现“亚洲悖论”现象 合作潜力未被完全挖掘》，中国日报网，2013年6月27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x/2013-06/27/content_16668594_3.htm。

③ David C. Kang, “Hierarchy, Balancing, and Empirical Puzzles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3, Winter 2003/04, pp. 165-180; Evelyn Goh,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3, Winter 2007/08, pp. 113-157; 孙学峰、黄宇兴：《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1期，第6~34页；孙学峰：《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32~48页；刘丰：《东亚地区秩序转型：安全与经济关联的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5期，第32~55页。

④ David C.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ring 2003, pp. 57-85;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eds.,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高程：《历史经验与东亚秩序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视角》，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第1~19页。

是冷战后期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研究重要的发展趋势。^① 有学者将这一趋势概括为比较政治研究层次的上升和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②

中国的历史经验和中国的崛起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构建提出了巨大挑战。^③ 中国将如何运用不断上升的实力？这一过程将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世界秩序的变迁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基于世界体系分析（world-systems analysis）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的理论假设，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落脚点来进行回应。世界体系分析强调“全球史观”的重要性，对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下的“现代性”持强烈的批判立场。的确，如果我们无法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更替思维定势，就不能理解中国传统的世界帝国治理经验与现代国家构建经验的独特性，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

① Peter J. Katzenste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Structures: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0, Issue 1, January 1976, pp 1-45; Peter J. Katzenstein, ed.,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Issue 4, October 1978, pp 881-912; James N. Rosenau,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Nichols Pub. Co., 1980; 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Issue 3, July 1988, pp 427-460; James D. Fearon, “Domestic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 1998, pp 289-313.

② 苏长和：《跨国关系与国内政治——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国际关系研究》，载《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第111~125页；李巍：《层次回落与比较政治学的回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7期，第52~56页；李巍：《从体系层次到单元层次——国内政治与新古典现实主义》，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5期，第134~150页；高奇琦：《论西方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理论路径的趋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4期，第84~105页。

③ 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反思和创新的文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Huiyun Feng,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Confucianism, Leadership and Wa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Feng Zhang, *Chinese Hegemony: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East Asian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从而就不能正确评估中国崛起对世界秩序变迁的真实影响。^①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亚洲秩序的历史变迁与中国内部变革的关系来证明，“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试图应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和摆脱国家脆弱性束缚的产物，它是中国传统的世界帝国治理经验和现代国家构建经验的延续与融合，旨在将中国的内部变革与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整合起来，最终创造出不同于霸权更替的体系变迁的可能。

二、世界体系分析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

（一）世界体系分析：从国家体系到世界体系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19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将产生于欧洲的民族国家作为基本的经验来源和分析单位，由此产生的传统与现代、西方与非西方，以及国家、市场和国内社会等研究对象的对立，是造成西方中心主义的根源。因此，他主张通过世界体系分析来构建具有全球史思维的、多学科一体化的新社会科学。^②世界体系分析试图发现国家在全球资本积累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等级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以及这种地位对其国内政治与国际行为的影响。^③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学派与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将整体的、历史的、多维度的世界体系，而不是抽象的国家及其体系，作为研究国际关系与社会变迁的基本单

^① 例如，唐健虽然指出“国家模式”会影响权力转移的具体方式，但他所归纳的三种现代国家模式，即“世俗—自由模式”“神圣—集体模式”和“威权模式”，本质上都源于西方民族国家，尤其是欧洲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经验。因此，他对中美关系走向的预测最终落入了“民主和平论”的窠臼，即中国只有彻底抛弃自己的“神圣目标”，不断趋向“世俗—自由模式”，才能防止在权力转移过程中与美国发生战争。参见唐健：《权力转移与战争：国际体系、国家模式与中国崛起》，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3期，第63～96页。

^② Immanuel Wallerstein, “What are We Bounding, and Whom, When We Bound Social Research”, *Social Research*, Vol. 62, No. 4, Winter 1995, pp. 839-856;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反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刘琦岩、叶萌芽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

^③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The States, 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位。^①沃勒斯坦指出，“世界体系分析非常不同于所谓‘国际关系理论’。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世界体系分析所探索的范围远远超过‘国际关系’。它力图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体系如何运作，包括世界体系的经济结构、政治框架、文化环境等，并把所有这些方面当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整体看待”。^②实际上，对于中国乃至美国、苏联/俄罗斯这类建立在具有多元族群和文化的超大经济社会基础上的超大国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它们视为抽象的政治实体，而同样应当将它们视为整体的、历史的、多维度的世界体系。例如，李彤（Li Xing）主张从四个相互联系的维度来理解中国的国家特性与历史经验，即“历史—文化的中国”（Historical-Cultural China），“革命的社会主义中国”（Revolutionary Socialist China），“经济的中国”（Economic China），以及“政治的中国”（Political China）。^③

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认为，行为（behavioral）、结构（structural）和进化（evolutionary）这三种二战后兴起的西方国际关系研究路径都受到科学主义，尤其是牛顿式决定论（Newtonian determinism）的支配，因而它们都对苏联解体导致冷战结束这样的结构性突变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和预测力。^④虽然比较政治研究层次上升和国际关系研究层次回落所形成的跨层次分析方法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世界秩序的整体变化，但由于二者仍然将抽象的国家作为划分研究对象的基本单位，它们对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实际上仍带有较强的机械决定论色彩。新古典现实主义试图建立“国际诱因—国内政治—政策选择”的因果链条，

① 虽然世界体系学派内部对世界体系结构特点（单中心还是多中心）和变迁规律（循环的还是进化的）的认知存在分歧，但是反对将民族国家作为考察现代世界历史的分析单位却是该学派的基本共识。关于世界体系学派的内部争论，参见龙向阳：《世界体系思想的流派与评论》，载《暨南学报》2004年第1期，第15～19页。

② 路爱国、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结构危机与世界的未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第10页。

③ Li Xing, “Introduction: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Capitalist World Order: The ‘Four China’ Nexus”, in Li Xing, ed.,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Capitalist World Or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2-16.

④ 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以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进行修正。^①但是，这一因果链条依然是单向的，即缺乏对国内政治影响国际体系变迁机制的分析。与之相比，世界体系分析的意义在于突破了将体系与单元对立起来的思维定势。具体而言，通过世界体系这一分析单位，研究者可以将连接体系和单元的跨国性变量，如资本积累、阶级分化、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及其相互作用整合起来加以考察，这对于理解国家行为与体系变迁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至关重要。

世界体系分析虽然与权力转移理论和霸权稳定论一样，重视对经济周期和霸权更替的研究，但它同时也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假设，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国家都是暂时性的历史现象。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变迁既有自我复制的趋势，即表现为霸权更替的“周期性循环”（cyclical rhythms），又有产生自我否定因素的“长期趋势”（secular trends），即表现为霸权持续时间越来越短，直至霸权周期性更替难以再现的“结构性危机”（structural crisis）。^②由此推论，西方民族国家构建与现代化经验并不是普世的，世界秩序也不可能永远由西方世界来主导，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最终将被彻底否定，至少不能继续依靠霸权周期性更替机制来维持结构稳定，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

结构性危机是世界体系学派对冷战中后期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变迁趋势的基本假设。该学派不少学者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①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1998, pp. 151-154; 陈志瑞、刘丰：《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构建与经验拓展》，载陈志瑞、刘丰编：《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32页。

^② Immanuel Wallerstein, “Structural Crises”, *New Left Review*, Issue 62, Mar./Apr. 2010, pp. 133-142; Immanuel Wallerstein, “Structural Crisis in the World-System”,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Vol 62, No 10, 2011, p. 31.

结构性危机的机制进行了研究。^①他们首先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以来经济长周期与霸权更替的关系——二者是这一体系中维持结构稳定的核心机制；然后重点分析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霸权衰落的政治经济逻辑，以及美国应对霸权衰落的战略；最后得出以下基本结论：第一，美国霸权的衰落意味着霸权周期性更替机制本身的失效，美国为应对霸权衰落所采取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战略反而加剧了这一进程。第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加快了西方世界内部的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以及非西方大国的崛起。这一切使全球性的经济金融中心与政治军事中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地理分裂，从而导致全球性的霸权难以再现。第三，全球性的“反体系”社会运动，以及国家的内部变革，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大国的内部变革，很可能会催生新的世界体系。

（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的机制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稳定是一种周期性的动态稳定，而这种周期性的动态稳定取决于资本和国家的力量平衡，以及资本积累等级结构的稳定。欧洲通过民族国家的构建率先实现了这种力量平衡，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源地并长期处于资本积累的中心。蒂利（Charles Tilly）根据强制（coercion）与资本的积累和集中的程度来划分欧洲国家的类型。其中，强制与资本的积累和集中程度都高，并且实现了二者力量平衡的国家最终能够在战争中胜出，进而成为地区乃至全球霸权。^②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认为，资本积累的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两个阶段周期性地相互强化，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维持结构稳定和地理扩张的核心机制。其中，霸权国家的存在是

^① Samir Amin, Giovanni Arrighi, Andre Gunder Frank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Dynamics of Global Crisis*,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2;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The States, 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 Giovanni Arrighi, Terence K. Hopkins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Antisystemic Movements*, London: Verso, 1989; Immanuel Wallerstein, *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Essays on the Changing World-Syst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Terence K. Hopkins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et al., *The Age of Transition: Trajectory of the World-System, 1945-2025*, London and New Jersey: Zed Books, 1996; Giovanni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7;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Samir Ami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he Manage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London and New Jersey: Zed Books, 2014.

^②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1990-1992*.

必要条件，因为它能够通过集中上一周期所积累的剩余资本（surplus capital）和世界权力（world power）凌驾于国际竞争之上，并促成国际合作，从而实现更大规模的物质和金融扩张。^①在哈维（David Harvey）看来，国家权力在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中扩张的动力与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为资本持续而有效率地开辟高利润、低成本的积累空间。^②

现代国家对经济社会的控制远比前现代国家严密，其相对自主性也更强。但维持国内政治秩序以及谋求和维持霸权地位的成本的提高，也迫使统治者必须不断汲取更多的经济剩余来实现国内和国际层次上的利益妥协。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现代化模式都出现了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倾向。^③20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为了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其国内政治合法性的侵蚀，通过构建福利国家体系培育出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保持相对独立性的“中产阶级”，但这同时也阻断了国内廉价劳动力的生成。与此同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和半边缘地区的现代国家的构建进程，加快了旧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其中，以苏联和中国这两个超大国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通过消灭私有资本并抑制经济社会自由，使巨量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摆脱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控制。上述两个因素提高了中心地区资本积累的成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的根源。

为了应对冷战威胁的上升和高利润、低成本的资本积累空间的丧失，美国最终陷入了军事凯恩斯主义的“过度扩张”之中，这极大削弱了美国维持作为全球资本积累关键机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构稳定的能力。越南战争的失败及其引发的战略收缩，则极大侵蚀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合法性，以及美国霸权对西欧和日本两大中心地区盟友的威信，这导致中心地区越来越难以作为一个整体来组织全球资本积累和应对来自体系边缘的挑战。面对过度扩张和经济滞胀的危机，新自由主义治国方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兴起，它旨在通过私有化、破除国内政治与地缘政治上限制资本积累的因素，从而为产业资本获取廉价的劳动力与原材料，并为金融资本开辟新的投机空

①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pp. 4-15.

② 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87-136.

③ Anthony 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pp. 295-309.

间。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福利国家体系增加了资本积累的劳动力成本和现代国家的统治成本，降低了资本积累的效率。因此，解除国家权力对资本积累的束缚，实现经济社会的“去政治化”，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要义。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取代福特—凯恩斯主义，意味着国家向金融资本交权。^①因此，在中心国家内部，新自由主义是以牺牲中产阶级的利益为代价来开辟资本积累空间的，这就削弱了国家对经济社会的整合能力，以及为平衡资本利益与国家利益而生的“温和自由主义”（centrist liberalism）意识形态的合法性。^②

新自由主义虽然起源于中心国家，但半边缘与边缘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却创造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蔓延的土壤。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国家孤立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发展的自主性。但是，苏联和中国构建各自版本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战略，并没有使自身与盟友彻底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制约，因为它们都没有创造出真正具有替代性的金融机制，而获取金融资源的能力是西方国家主导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美国赢得冷战的关键。^③事实上，不少社会主义国家重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以接受新自由主义教条为代价的。例如，苏联和东欧在接受了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所鼓吹的“结构调整方案”（SAP）后，被改造为廉价的资本积累场所。^④也就是说，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所创造的经济剩余不仅无助于增强国家实力，反而成为了国家解体、再次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化的诱因。

此外，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精英越来越将经济发展绩效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这也促进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

①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p. 165.

② 关于“温和自由主义”的起源、内涵及其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稳定和地理扩张的意义，参见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V: Centrist Liberalism Triumphant, 1789-1914*,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③ Giovanni Arrighi, “The World Economy and the Cold War, 1970-1990”, in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ume III Ending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3-44.

④ Samir Ami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p. 13.

角色。^①中国通过对美和解重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试图从全球市场经济中获取新的发展契机，这为高利润、低成本的资本积累空间的重建打开了一道巨大的缺口，从而将美国和西方国家从过度扩张与滞胀危机中解救出来。而且，中国重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对体系边缘地区产生了复杂的影响。正如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所言，中国进入国际市场导致原料价格急剧下降，这对高度依赖原料出口的第三世界国家造成了巨大压力；中国国内市场的开放吸收了大量的国际大资本，这极大增强了它们的垄断能力，从而削弱了第三世界国家参与全球市场经济的议价能力；中国对以物易物贸易模式的抛弃，削弱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贸易竞争力；中国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非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选择，这加速了冷战的结束。^②

新自由主义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赢得冷战的关键因素。^③然而，新自由主义同时也导致全球性的政治经济权力发生了地理上和功能上的分裂，从而成为加剧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的动力。第一，随着西欧和日本对于国家自主性日益强烈的追求，美国霸权越来越难以在体系中心凝聚战略共识。第二，东亚国家并没有像东欧国家那样全盘接受新自由主义教条而导致国家权威瓦解，融入全球市场经济反而激活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所蕴藏的经济潜力，建立在经济绩效之上的政治合法性也得以强化，由此产生的相对稳定的国内秩序又成为吸引更多国际大资本的因素。第三，冷战结束以来，为了填补苏联解体形成的战略真空，美国一度陷入了依靠局部战争开辟资本积累空间的战略狂热。在这一过程中，为海外军事行动融资导致美国的国家利益越来越屈从于金融资本的利益，滥用军事暴力也使得地缘政治局势不断恶化。其结果是，国际大资本进一步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为了应对这些国家的权力增长，美国更加依赖军事暴力与军事同盟关系。第四，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对国家权威的冲击所引发的经济社会动荡，导致了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的崛起。尤其是 2008 年以来，各个国家在由金融资本投机所引发的

① 在哈维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见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年版，第五章。

② 文安立：《中国、第三世界与冷战的最后年代》，陈兼译，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著：《冷战国际史研究 IV》，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1~133 页。

③ Michael H. Hunt, *The American Ascendancy: How the United States Gained and Wielded Global Dominance*,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pp. 266-307.

全球经济危机中自顾不暇，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也趁势而起。这些因素都极大削弱了既有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与合法性。

总之，新自由主义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陷入了一种结构性危机：一方面，资本积累中心已经不可能由单个国家所掌控，另一方面，在国际层次又缺乏总体性的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结构对全球资本积累进行管理。^①也就是说，全球资本积累的无限性与民族国家主权边界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难以在霸权主导下通过开辟高利润、低成本的资本积累空间来克服。

三、世界帝国、冷战与“亚洲悖论”

二战结束以来，随着日本、“四小龙”和中国的相继崛起，国际大资本的不断涌入，以及美国对其亚洲军事存在的强化，亚洲成为决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命运的地方。阿锐基（Giovanni Arrighi）指出，“苏联解体后，世界性军事力量更集中在美国和它最亲密的盟国手里，资本积累的世界性过程的中心却从美国逐渐转移到东亚地区。……这一史无前例的现象使以一个国家为基地的新世界霸权不大可能出现”。^②也就是说，全球性的资本积累中心和政治军事力量之间的地理分离，导致“军商一体、战争立国、国强必霸”的西方民族国家构建模式难以再现，并且成为维持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周期性强化的机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对亚洲所造成的冲击是，既有的国际政治结构越来越难以适应这一地区的经济繁荣，也就是说，亚洲快速发展的经济一体化缺乏内生的、有效的政治安排与安全保障。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用“亚洲悖论”（Asia Paradox）来概括这种现状：“一方面，各国之间在经济方面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领土主权和历史遗留问题给这一地区带来了紧张。”^③当前，由于亚太地区存在着中国和美国分别主导经济与安全秩序的趋势——至少在中美两国和地区其他国家的认知中是如此，

^① Samir Ami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Introduction, p. xxxiii

^② 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姚乃强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文版序，第2页。

^③ 《朴槿惠：东北亚出现“亚洲悖论”现象 合作潜力未被完全挖掘》。

“对冲”(hedging)成为地区中小国家普遍的行为逻辑。^①因此,“经济崛起引发权力转移,权力转移导致战争和霸权更替”的经典理论模型难以对亚太国际关系的现实做出具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其根本原因在于,亚洲不是作为抽象的政治实体的集合,而是作为一个或多个地区性的世界体系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这使得亚洲的现代国家构建和国际关系实践很难套用西方经验。

(一) 世界帝国的遗产与作为世界体系的亚洲

亚洲之所以成为国际大资本地理扩张的目的地,是因为其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以及能够将这种廉价劳动力高度组织起来服从于资本和国家利益的政治与文化结构,这是高利润、低成本的资本积累空间形成的必要条件。被世界帝国长期统治,并且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则是亚洲没有全盘接受新自由主义教条,从而能够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构成巨大挑战的根本原因。

沃勒斯坦将世界体系(world-system)定义为“一个具有单一劳动分工和多元文化体系的单位”。世界体系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有共同政治体系的世界帝国(world-empire),另一种则是被众多民族国家分享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world-economy)。现代世界秩序形成的过程,就是起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取代世界帝国,即一个世界体系取代非欧洲世界的多个世界体系的过程。沃勒斯坦同时强调,19世纪的“帝国”如英国与法国并不是世界帝国,而只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拥有“殖民地附属物”(colonial appendages)

^① Shannon Tow, “Southeast Asia in the Sino-U. S Strategic Balanc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6, No 3, 2004, pp 434-459; Denny Roy,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7, No 2, 2005, pp 305-322; Evelyn Goh, *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The U. S. in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Policy Studies Monograph, No 16, Washington, D. C.: East-West Center, 2005; Evan Medeiros, “Strategic Hedging and the Future of Asia-Pacific Stability”,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 No 1, Winter 2005/06, pp 145-167; Kuik Cheng-Chwee,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0, No 2, 2008, pp 159-185; 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4~32页;刘丰、陈志瑞:《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4期,第4~25页;陈庆鸿:《菲律宾对华对冲战略评析》,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6期,第133~154页;Gilford John Ikenberry, “Between the Eagle and the Dragon: America, China, and Middle State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31, No 1, 2016, pp 9-43.

的民族国家。^①事实上，欧洲国家对非西方世界的征服是通过充分利用而非彻底消灭非西方世界既有的世界帝国所创造的政治经济结构才得以实现的。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指出，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国家发现介入中国和印度主导下的亚洲内部贸易体系比进行欧亚长途贸易更有利可图，所以并没有尝试彻底破坏原有的维持亚洲内部贸易体系正常运转的政治经济结构，而是“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②在孔飞力（Philip A. Kuhn）看来，海外华人社会是欧洲国家的东南亚殖民地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③张文木认为，英国将现代印度塑造为“英属印度”与“土邦印度”的混合体，这在英国霸权鼎盛时可以减小统治印度的成本，而在英国霸权衰落后则可以防止印度洋乃至亚洲被其他大国单独控制，从而使英国有机会重新介入亚洲事务。^④因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虽然起源于欧洲，但欧洲国家资本积累的地理扩张却使这一体系的政治结构日益多元化，即体系之中并非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与世界帝国自成世界体系不同，民族国家只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政治结构，它只能存在于与其他民族国家的体系性关系（systemic relations）之中。^⑤在基辛格看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给出了分配和维持权力的方法，但没有解答如何产生合法性”。^⑥沃勒斯坦认为，由于民族国家体系缺乏统一的政治结构，资产阶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利润被政治权力剥夺，“因为各国统治者将不得不对多种多样的利益和压力做出反应”。^⑦然而在亚洲，世界帝国虽然没有使资本主义成为组织市场经济的主导机制，但是在组织动员经济社会创造物质财富上，却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经验。在前资本主义时代，

①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Concept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16, No 4, Sep. 1974, pp 390-391.

②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③ Philip A.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9, pp 55-106.

④ 张文木：《“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互动规律和特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期，第29~32页。

⑤ Anthony 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p 4.

⑥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475页。

⑦ 同上，第127页。

亚洲就已经形成了跨族群、跨文化的超大规模的市场经济体系。^①这种市场经济体系之所以能够形成并长期存在，是因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世界帝国创造了组织和动员经济社会力量的非资本主义机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指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反市场”力量，它必然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②世界帝国为了在具有多元族群和文化的超大经济社会之上建立起稳固的政治合法性，必须消除空间和时间上的经济发展失衡，因而不能让资本利益凌驾于国家权威之上。^③

但是，世界帝国对经济社会的掌控远不及民族国家严密。单一民族和有限的主权边限定限了民族国家对经济社会的义务，而服务于资本利益和应对不断的对外战争又提高了民族国家官僚体系的效率及其对经济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④与之相比，由于“经济因素在比任何政治实体所能完全控制的范围更大的领域内发挥作用”，^⑤世界帝国难以对具有多元族群与文化的超大经济社会实现彻底的政治整合，但也正因为如此，亚洲超大规模的跨族群、跨文化的市场经济才得以生成。正如沃勒斯坦所言，“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世界帝国的框架内繁荣”，因为“这种政治结构所必需的官僚制度吸取了过多的利润”，减少了“剩余的东西从低阶层向高层，从边缘到中心，从多数人向少数人的流量”。^⑥例如，尽管明清两大帝国不断尝试将其臣民限制在乡土社会的农业生产中，但也未能阻止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沿海地区商人利益集团的崛起，最终甚至还试图利用海外华人所创造的经济剩余来弥补日益增长的统治成本，而后来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也充分利用了海外华人这一世界帝国的遗产。^⑦此外，在朝贡体系中，朝贡国与中国的政治关系虽然是不平等的，

① 关于前资本主义时代亚洲市场经济的研究，参见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 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顾良、施康强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0页。

③ Giovanni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 326-329.

④ 王国斌（R. Bin Wong）认为，比较欧洲现代国家和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机制，应当从国家面临的挑战、具有的能力和承担的义务这三个维度来进行。参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

⑤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罗荣渠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2页。

⑥ 同上，第13页。

⑦ 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但朝贡国并未因此丧失其既有的国家特性，即中国没有实现、也很少尝试对朝贡国进行直接统治。而且，朝贡国对中国权威的认同，也取决于其与中国的贸易是否有利可图，以及中国内部的统治秩序的合法性是否稳固，即中国是否值得尊敬和学习。^①

世界帝国的治理经验并没有随着亚洲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成为现代亚洲国家构建和地区治理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朝贡体系的经验表明，只有具有强大自给自足能力的大国才能充当体系中心，因为这样的大国一方面能够削弱既有的体系压力对自身的影响，另一方面能够通过自身的内部变革塑造新的体系压力。只要作为体系中心的大国能够保持至少是形式上的政治统一和内部经济社会的稳定，就能够创造出可观的经济剩余来维持整个亚洲市场经济网络的正常运转。例如，由于美国与中国相似，也是一个拥有多元族群和文化的超大国家，并且对于美洲以外的地区而言，它是一个“外来者”，因此，美国要主导世界秩序也必须学习借鉴世界帝国的治理经验。有学者指出，美国所建立的霸权秩序，尤其是二战后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亚洲资本积累与安全合作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现代版的朝贡体系。^②

（二）“亚洲悖论”的生成及其影响

亚洲冷战体系的独特性，以及中国重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亚洲悖论”产生的基本动力。美国与苏联这样的根据严密的意识形态体系“设计”出来，并且从大规模、长时间的工业化战争中迅速崛起的超大国家，催生了冷战体系。英国霸权的衰落与瓦解表明，在全球绝大部分土地和人口已经被主权边界与现代民族所分割控制的年代，如果缺乏应对大规模、长时间的工业化战争的能力，以及创造、传播与垄断意识形态话语的能力，即使垄断了金融资本与贸易网络，也不可能维持全球性霸权，而且这种垄断地位也将很快丧失。德国与日本在二战中的溃败，则意味着民族国家已经无法完全通过军事手段建立霸权秩序。美苏拥有世界帝国那样巨大的经济体量，在现代国家结构与扩张性意识形态的组织动员下，它们有比世界帝国更强的能力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实现地缘政治意图的强大战争力量。正如沃尔兹

^① 这实际上是郑和下西洋的根本目的。

^② Giovanni Arrighi, “China’s Market Economy in the Long Run”, pp. 31-32; 邱云峰：《美国的朝贡体系》，载《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4期，第36~88页。

(Kenneth N. Waltz) 所言,“只有那些具有洲级国土规模的国家,才能在大国层次上进行竞争”。因为规模“赋予了它们一定的控制能力,同时使它们免受其他国家行为的影响”。^①虽然全球性权力逐渐集中于美国与苏联这种现代版的世界帝国,但这种权力转移过程也是片面的和分裂的。无论是美国阵营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苏联阵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式与社会主义制度,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这种多元化改变了冷战两极对抗的性质,也是后冷战时期世界权力多极化的起源。因此,虽然美国最终赢得了冷战,但是对市场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的胜利,以及极权、威权主义的消亡做出定论还为时过早。^②其中,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独特的现代化模式及其经济崛起,重塑了东亚地区的“现代性”,这导致了冷战从东亚开始转型。^③因此,亚洲国家的内部变革和东亚经济一体化,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生政治经济中心地理分离的关键动力。

作为在历史上长期主导亚洲地区秩序的两个世界帝国,中国与印度通过各自的现代国家构建倒向或亲近苏联阵营,这一方面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失去了巨大的资本积累空间,另一方面也导致亚洲难以完全被西方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支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所采取的战略是通过提供军事保护与开放国内市场,将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盟友建立改造为效忠美国的“半主权”政治实体,进而将它们纳入为美国的亚洲冷战政策融资和出力的军事凯恩斯主义体系。然而,与历史上的亚洲世界帝国不同,美国的体系中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以亚洲内生的地区贸易网络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军事优势和通过雅尔塔协定获得的地缘政治特权的基础之上。正如阿锐基所言,中国的中心地位是由亚洲各个经济体的相对规模与成熟度来决定的,而美国的中心地位则是由军工复合体的相对实力决定的。^④因此,美国主

① 肯尼斯·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171页。

②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83-286, 295.

③ Chen Jian, “China and the Cold War after Mao”, in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ume III Endings*, pp. 181-200; 陈兼:《激进革命与“保守选择”的对峙:关于冷战时期东亚地区现代化道路之争的若干思考》,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23~34页;陈兼:《全球冷战与中国“漫长的崛起”》,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著:《冷战国际史研究15》,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27~42页。

④ Giovanni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 346-347.

导的亚洲世界体系必然会发生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的脱节。

中国在冷战中选择了“反体系”的立场，而美国又是域外国家，其战略重心还要被分散到冷战体系中的欧洲部分。因此，日本成了作为世界帝国遗产的亚洲地区市场经济网络的主要继承者和最大受益者。然而，日本的经济体量有限，加之其战败国的地位，使其不可能真正成为亚洲世界体系的中心，哪怕只是经济意义上的中心。因此，日本除了要仰仗美国的政治军事庇护，还必须严格遵循亚洲世界体系的长时段历史规律，充分利用世界帝国的遗产，其中最重要的遗产正是遍及亚洲的海外华人资本。不仅是日本，“四小龙”的经济崛起，以及其他东南亚海岛国家的现代国家构建，同样离不开海外华人资本的支持，它们共同塑造了新的亚洲经济相互依赖网络。^①但是，这些新兴资本积累中心的领土和人口有限，地理分布又相对分散，加之它们的“半主权”身份，决定了新的亚洲世界体系缺乏内生的、强有力的、具有合法性的中心。因此，亚洲经济剩余的分配与利用，以及国家间的利益协调、争端处理甚至边界划分，都不得不服从于美国的霸权利益与冷战政策。

随着中国和俄罗斯相继重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实现了政治和解，冷战最终失去了意识形态基础，巨大的经济体量也使它们获得了国际大资本的青睐。对于美国和日本而言，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体系外的敌人变成了体系内的竞争对手。因此，进入 21 世纪以来，亚洲重新形成了美日与中俄两大集团对峙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冷战并没有真正结束，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转型。尽管选择了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妥协，世界帝国与社会主义实践的遗产却依然在中俄各自的国家治理和对外政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俄罗斯为了应对美国的遏制，改善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为国内治理构建新的意识形态，从世界帝国治理欧亚大陆的历史经验中发展出了“新欧亚主义”（Neo-Eurasianism）思想。^②此外，亚洲冷战体系的政治安排依然存在。首先，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和其他领土争端悬而未决，

^① Alexander Irwan, “Business Networks and the Regional Economy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h. D dissert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 1995; K. S. Jomo and Brian C. Folk, eds., *Ethnic Business: Chinese Capitalism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② Alexander Dugin, *Eurasian Mission: An Introduction to Neo-Eurasianism*, Berwick-upon-Tweed: Arktos Media Ltd., 2014; 孔元：《欧亚主义回归与全球革命：亚历山大·杜金的地缘政治观》，载《文化纵横》2015年第5期，第88~95页。

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尚未真正完成，这导致中国虽然重新成为亚洲市场经济的支柱，但却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国内政治基础。其次，日本作为亚洲市场经济的关键支点，却依然受制于雅尔塔体系，为了摆脱经济发展停滞和社会危机，它很可能重新走上“战争立国”的传统民族国家构建道路。最后，朝鲜依然游离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朝鲜战争还处于停战状态，朝韩两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也没有真正完成。

综上所述，在美国霸权持续衰落，而亚洲世界体系内生的、强有力的、具有合法性的中心又无法及时生成的情况下，结构性危机将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从理论上讲，如果某个亚洲国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下一任霸权，倒也可以打破“亚洲悖论”，进而将整个体系从政治经济中心地理分离的结构性危机中解救出来。然而，至少就目前来看，亚洲缺乏产生新霸权的基本条件。第一，只要亚洲冷战体系的历史遗产依然存在，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驱动的“战争立国”战略就很可能成为各国内政外交的主要选项。这将加速亚洲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权力分裂，而不是权力转移。第二，中国的崛起总体上依然是片面的，即主要是在经济领域的崛起。而且，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不对称的，两国对于全球市场的依赖程度有差异。正如布赞和考克斯（Michael Cox）所言，“中美两国都依赖外部资本、市场和技术，但相较于美国，中国依赖资本主义世界的程度反而似乎要更高”。^①第三，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化倾向将进一步加剧亚洲经济结构与安全结构的脱节甚至对立，从而增加亚洲中小国家选择并实施对冲战略的成本。第四，美国的亚洲盟友在尚未真正完成现代国家构建，而且对美国的国内市场和军事庇护的依赖程度依然强烈的情况下，追随美国依然是较为现实的战略选择。可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对崛起国和中小国家的冲击可能更大。尽管如此，作为一个超大国家，中国自成相对独立的世界体系的国家特性，决定了其内部变革客观上具有体系层次的意义。对于中国而言，在既不可能重建传统世界帝国秩序，又不可能孤立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的今天，如何处理国内矛盾，如何利用亚洲世界帝国的遗产，以及在全球资本积累中日益凸显的金融优势，一方面决定了美国霸权和西方国家能否获得巩固既得利益所需的资本积累空间，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否获得公平利用全球市场资源的机会。

^① 巴里·布赞、迈克尔·考克斯：《中美两国“和平崛起”之比较》，管传靖、段然译，载《国际政治科学》2014年第3期，第135页。

四、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与“一带一路”倡议

(一) 中国的国家脆弱性

中国不是、也难以成为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①因此，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必然是复杂纠结的。有学者认为，“‘中国’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而是一个帝国；‘中国’不是具有内在同一性的民族，而是一个由它的上层文化强制关联在一起的、缺乏内在联系和认同的社会体”。^②这种观点可能有些极端，但却指出了中国的国家特性，尤其是国家脆弱性。

由于民族国家产生于西方世界长期的政治分裂和频繁战争冲突之中，再加上“资本没有祖国”，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始终缺乏稳定的政治中心，这集中体现为越来越短的霸权周期。因此，通过主权、宪政和均势等结构不断重塑国家、资本和社会之间的政治边界，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维持结构稳定的基本方式。中国则与此不同。地理屏障的庇护，以及缺乏强大的外部威胁，使得中国的中央集权能够自然形成并不断再生。然而，自然地理条件、族群和文化差异，也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力量分布不平衡的基础。超大的经济社会内部存在类似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有学者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指出，中国历史的演进具有多中心、多线性和等级化的特征。^③因此，中央集权始终难以对超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实现直接统治和彻底的政治整合。其后果是，一方面，中央集权的不断再生，导致官僚体系为基础的正式制度随之变得僵化保守且恶性膨胀，大多数经济社会力量都倾向于通过争夺或依附政治权力来获得发展机会。正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言，“从很早以来，中国的经济就表现为由最大数

① 例如，甘阳和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用“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这一概念来理解中国的国家特性和中国的崛起。参见甘阳：《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载《书城》2004年第2期，第35~40页；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汪晖和葛兆光则从思想史与文化史的高度对“什么是中国”和“什么是现代中国”这两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他们都认为不能将中国理解为民族国家。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04年版；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

②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11页。

③ 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鲁西奇：《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量的人共同争取少量的自然资源，而不是去开发大陆和新的工业。从事创新的企业、为新产品争取市场的推动力，不如争取垄断、通过买通官方取得市场控制权的推动力来得大”。^①另一方面，由于中央集权的实际治理能力不足，附着于宗族关系或市场经济之上的非正式制度无序生长，并且绑架了地方政权和基层社会。前者缺乏吸收后者参与国家政治并加以改造的合法有效的机制，后者使国家权力难以真正深入地方基层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受制于官僚体系的既得利益，难以通过正式制度来驾驭非正式制度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形式上的大一统秩序，国家要么选择高度依赖暴力、皇帝的个人超凡魅力和单一的意识形态，要么只能选择同既得利益与非正式制度妥协，而选择妥协是历史的常态。正如傅衣凌所言，“所谓‘天下可传檄而定’的说法，既说明基层社会实际上控制于地方势力手中，并可通过他们消除地方上的不安定因素；又反映了整个社会需要一个大一统国家政权的心理”。^②滨下武志也对这种国家治理方式进行了概括：“官僚机构并不试图介入建立在宗族、地方和行会基础上的民间社会秩序，它只是试图通过强制性的税收来控制经济。官员也尽力不渗入到民间秩序中去，而且他们确实也竭尽所能避免卷入其中。在藩属地区（藩部）也可以看到类似性质的管理模式，例如在位于中国边疆的蒙古、西藏和新疆，都有并行的地方自治和中央派驻官僚的组织机构。”^③

可见，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是中国根深蒂固的国家脆弱性，这不仅导致了世界帝国的“治乱循环”，也使得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经常陷入困境。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发现，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统治者为了应对频繁的国内和对外战争，创造出一种掠夺性的财政金融结构，即“赢利型经纪”，它是现代的国家官僚体系与传统的基层社会非正式制度狼狈为奸的产物。^④费正清指出，“帝制时代的机构，可能以新的名目出现。例如古代的互相监督的保甲制度，今天就会变成街道办事处，或者20世纪以前的下级士绅后来变成了民国时代的士

①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② 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3页。

③ 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王玉茹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④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豪劣绅，以及成为继他们之后而出现的党员干部和今天的农村党委书记”。^①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所谓的“盛世”，只不过是经济社会还能够产出足以维持各种利益集团妥协共存与大一统秩序合法性的经济剩余。然而，由于自然灾害频繁，人口过度增长，加之国家治理的灵活性不足、政治纠错能力低下，经济剩余往往不能持续稳定地产生。此外，在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中国经济剩余的产生还取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稳定。因此，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始终存在不断扩大的风险，国家治理也随时面临巨大的考验。

尽管如此，长时段的历史经验表明，只要能够维持哪怕只是形式上的政治统一，保证较长时间的国内和平，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人口就可以很容易地创造出可观的经济剩余。此外，亚洲“不对称破碎”的地缘政治结构对于中国而言是一种优势，这使得中国即使遭遇外部入侵或陷入孤立，也拥有巨大的战略回旋余地。^②因此，中国倾向于通过财富诱惑和文化吸引力的非暴力手段，以及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方式来处理对外关系。但这并不是中国仁慈慷慨的文化基因的产物，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国家治理能力不足在对外政策上的表现。庄国土认为，朝贡制度并没有将中国的东南沿海的商业资本转化为对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政治影响力，因为它只是一种“根据一厢情愿的中国文献演绎出来的传统东亚国际关系体系”，其存在的基础是“中国统治者虚骄的自我标榜和官吏文人为取悦皇上的阿谀奉承，以及海外诸国统治者或官员和商人以朝贡名义谋求经济利益”。^③因此，当西方国家侵入亚洲世界体系后，中国无力也无心对朝贡国加以庇护，甚至最终自身难保，中国的中央政权随之丧失了国际威望，其国内政治合法性也随之瓦解。

（二）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实质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构

中国是以边缘国家的国际身份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但独特的世界秩序观和世界帝国的历史记忆，使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身份困惑比其他边缘国家更加强烈。正如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所言，中国卷

^①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10页。

^② 张文木：《“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互动规律和特点》，第27～28页。

^③ 庄国土：《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载《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第7～8页。

入民族国家体系的方式决定了它不可能永远顺从地遵守西方世界制定的规则。^①在外部入侵所催生的“受害者心态”的支配下，中国既有成为民族国家体系中平等一员的理想，更有重建以自身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理想，这在毛泽东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即国内政治中的“继续革命”与对外政策中的“输出革命”相得益彰，二者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②实际上，为了继承世界帝国留下的传统势力范围，塑造民族与主权的边界，中国革命和现代国家构建也不可避免地吸收了世界帝国的治理经验。在汪晖看来，如果彻底抛弃清王朝“多元性帝国”的治理体系，现代中国将失去大量领土。因此，“中国近代的民族运动和国家建设将前19世纪混合型的普遍主义帝国体制的若干特征和内容直接地转化到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之中”。^③王赓武指出，对中国而言，“党国”（party-state）是“皇朝”（emperor-state）的现代表现形式，它肩负着塑造一个崭新的现代国家的责任。^④沈志华认为，冷战时期中国在处理边界问题上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天朝”观念，而“世界革命”和“不断革命”的思想又强化了这种观念。^⑤可见，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增加了它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复杂性。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如何对发展不平衡的超大经济社会进行政治整合，即处理好经济社会自由与政治统一，集权与分权，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困扰中国统治者们的千古难题。在孔飞力看来，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有三项“根本性议程”：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第二，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第三，国家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⑥汪晖认为，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革命的目的，是在“革命”“解放”和“合法权利”等名义下，将个人重新组织到国家主导的集体体制之中，从而赋予了现代国家对于个人的

①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292页。

②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③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21页。

④ 王赓武：《文明、皇朝与民族国家：中国的转型》，载王赓武：《华人与中国：王赓武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8~98页。

⑤ 沈志华：《事与愿违：冷战年代中国处理陆地边界纠纷的结果》，载《二十一世纪》2014年8月号，第52~61页。

⑥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页。

更为直接的控制权。^①总之，建立起兼具有效性与合法性的中央集权，将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人口从各种剥削性的非正式制度中解放和组织起来，在限制国家权力恶性膨胀的同时实现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根本任务。

然而，毛泽东试图抑制传统社会的市场经济自由，并且切断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联系，进而利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推动经济发展、防止官僚体系产生既得利益集团的设想，最终未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在对抗性的冷战国际体系中，以牺牲经济社会自由为代价来换取国家安全与政治统一，实属无奈的历史选择，毕竟战争也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强大动力。^②但是，试图通过构建高度同质化的政治结构和理想化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更何况还要利用它们对多元性强、发展严重不平衡的超大经济社会进行改造。中国历史上鲜有成功的案例。早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英国外交部对中国的未来就做出过这样的预见：“我们尤其要记住，事实将会证明，中共政权最力所不及的任务之一可能就是严密地管辖和控制单个的中国人中深深扎根的经商爱好，只要利用中国人的经商天分，损害共产主义事业的希望依然存在，彻底放弃我们的在华地位便至少可以说为时过早。”^③

尽管如此，根深蒂固的国家脆弱性并不能否定中国的大国地位，因为强大的自给自足能力和世界帝国的遗产决定了中国无论选择孤立还是融入，都能够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变迁产生结构性的影响。这无疑增加了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正如章百家所言，“每当国际体系发生重大变动的时候，也正是中国内部出现深刻变化的时候。……每次国际体系的转换，在其初期看来往往对中国不太有利，然而每次变动的结果都是中国的国际地位获得不同程度的改善或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也有所扩大”。^④因此，中国与西方国家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即使不是对抗性的，也必

①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96页。

② 关于战争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的作用，参见李月军：《从传统帝国到民族国家——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战争逻辑》，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26~45页。

③ 《英国外交部备忘录（1949年8月19日）》，载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④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7页。

然是竞争性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既得益于又受制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用新的战略来指导国内治理与对外政策。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

再次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与国家治理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以人均收入衡量的国民财富是国家实力的主要来源。即使追求国家实力的目的是要让世界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改变，中国共产党也只能根据现存的资本主义规则来参与世界政治的游戏，除此别无选择”。^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社会稳定越来越取决于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绩效，即通过创造更多的经济剩余来维持各种政治社会力量的妥协。然而，将政治合法性仅仅建立在经济绩效的基础上，加之中国基层社会所蕴藏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强大能量，很容易强化在长时段历史中形成的国家脆弱性。^②事实上，当前创造经济剩余所依托的国家治理结构是由犬牙交错的官僚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垄断资本利益共同支配的。与此同时，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人口作为创造经济剩余的主体，却无有效的利益表达和影响实际的政治过程的方式和途径。也就是说，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中央权威与基层社会建立政治联盟，而这种政治联盟恰好又是中国革命成功的主要经验，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因此，一旦经济剩余的产出不能首先足以维持既得利益集团内部的妥协，进而维持国家与经济社会的利益妥协，现存的国家治理结构将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沿海与内陆地区在国际化过程中受到的影响不同，进而在国内政治和外交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③在这种情况下，复杂的利益关系使得国家在推

① Giovanni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372.

② 赵鼎新指出，“……国民经济也不可能永远好下去。因此，一旦国内经济发展出现停滞，一旦国家财政收入不能再以每隔几年就翻一番的速度增长，胃口早已被吊大的中国老百姓的情绪就会向同一个方向集聚”。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二版序，第7页。

③ 谢淑丽：《国际化与中国的经济改革》，载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主编：《国际化与国内政治》，姜鹏、董素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220页；苏长和：《国际化与地方的全球联系——中国地方的国际化研究（1978～2008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第24～32页。

进改革的过程中越来越“投鼠忌器”。^①

中国经济剩余的产出不仅与自身的国家治理结构密切相关，更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治理结构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中国客观上同样需要不断开辟低成本、高利润的资本积累空间才能维持国内利益的妥协，而且这种战略需求可能比西方国家更加强烈。但是，中国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金融和贸易规则的最初制定者。因此，中国虽然能够凭借由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人口支撑起来的制造业在全球资本积累中获得巨大利益，但是在全球资本积累中却处于较低的等级地位，因而必然要为此付出更大的政治代价。冷战结束至今，中国的对外政策大体上还是坚持了“韬光养晦”的原则。而且，随着对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现存国际组织参与率的提高，并且从遵守国际规则以及西方国家的合作中受益，中国越来越倾向于采取维持现状的政策。^②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增加了中国在国际层次乃至国内政治中进行批判性的制度创新的成本。其中，为了海外投资的安全与国内资本积累的顺利进行——这两者是高度关联的——中国不得不对边缘与半边缘地区的“反体系运动”尽可能采取回避甚至反对的态度。沃勒斯坦认为，在新自由主义与反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中，“中国迄今为止处于奇怪的缺席状态。……中国正在失去参与最近的将来最重要的政治斗争的机会。……事实上，中国全力推进经济增长恰恰是令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变得更加尖锐的因素之一。因此，在中国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会瓦解掉”。^③长此以

① 赵鼎新指出，“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政府的政策大规模向资本倾斜。……政府没有让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制度化的、社会运动式的抗争，或是利益集团式的讨价还价的勇气”。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二版序，第5页。在汪晖看来，“中国在20世纪末期迎来了大规模的‘工人阶级再形成’的时代。产业转移也意味着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的转移，但这一转移是在社会主义体制的衰落和转型过程中发生的，也是在19~20世纪的阶级政治的衰落和转型中发生的；无产阶级政党快速地‘中性化’正是这一转型的政治特征，其结果是新的工人阶级在政治领域没有自己的代理人，公共政策不可避免地朝向资本集中的方向倾斜”。参见汪晖：《再问“什么的平等”？——论当代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的脱节（上）》，载《文化纵横》2011年第5期，第67页。大卫·哈维也尖锐地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私有化’道路……国家操控的市场经济，带来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年均增长10%），并提高了相当多人民的生活质量。但经济改革也造成了环境破坏、社会不平等，最终还有某种看上去令人不安的事情——资产阶级力量的重建”。参见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页。

② Alastair Iain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③ 路爱国、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结构危机与世界的未来》，第9~10页。

往，中国将在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滞后于经济增长，并且缺乏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支持的情况下，不得不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霸权进行直接对抗。

根据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变迁的历史经验，当崛起国在开辟资本积累空间和巩固国内政治合法性的过程中面临困境时，通常会实施两种“战争立国”战略。一是像德国与日本那样，直接通过发动对外战争开辟低成本、高利润的资本积累空间，并且利用战时动员机制整合国内经济社会。二是像美国那样，通过利用或间接制造地缘政治危机，进而投资海外战争的方式输出剩余资本、转嫁国内矛盾。然而，暂且抛开主观意愿不谈，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的出现和蔓延，使得当今中国缺乏通过“战争立国”战略谋求单极霸权的客观条件。第一，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后，整个国际社会失去了对新世界体系的想象力和构建热情。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都高度依赖新自由主义化的世界体系，都希望在结构性危机彻底爆发之前，尽可能在全球市场中大赚一把。从这个角度看，美国霸权自然或被动的快速衰落缺乏合法性基础。第二，冷战结束以来，随着西方世界内部矛盾的扩大，以及中小国家追求发展自主性的动机与能力的增强，真正的全球均势正在逐渐形成，这导致即使是美国也难以顺利实施“战争立国”战略。第三，起源于西方世界的全球经济危机，西方民主制度逐渐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以及美国新保守主义战略造成的地缘政治乱局，极大地削弱了“华盛顿共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但是，非西方世界又缺乏能够与西方世界相抗衡的“现代性”话语。例如，所谓“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尚未经受足够的历史检验，甚至这些概念本身也饱受争议。因此，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没有共识、没有榜样的全球性焦虑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崛起”与“不称霸”的承诺就成为了中国在外交上仅有的政治资本。

综上所述，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中国就不可能有成熟的外交决策机制；如果不能消除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进而理顺超大规模经济社会内部的复杂利益关系，并对其完成真正的政治整合，中国就不可能形成清晰长远的对外战略。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认为，国家内部的精英共识、精英凝聚力、社会凝聚力以及政府/政权脆弱性等变量，决定了国家应对外部威胁的行为逻辑。^①文安立指出，除非中国政府能够建立更广泛

^①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的政治代表性，否则中国很难灵活地调整自身与世界的关系。^①因此，在现代国家构建的根本任务尚未真正完成之前，中国必须要思考还能在多长时间从美国霸权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获得多大的利益，进而要思考如何在尽可能避免触及中心国家与美国霸权的战略底线、提高它们对华战略容忍度的前提下，提升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本文认为，中国只有主动肩负起大国责任，将自身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整合起来，尤其是要主导构建一个能够代表大多数国家利益，尤其是半边缘、边缘国家利益的新世界体系，才能防止自身尚未实现全面崛起，就同美国霸权发生冲突，并且与中心国家一起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所吞没。

（四）“一带一路”倡议是具有世界体系构建意义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既受益于、也受制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一方面，中国的发展客观上需要引进西方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并且获得自由进入全球市场，尤其是西方国家市场的机会，而有限的国家实力决定了中国无法承受与美国霸权乃至整个西方世界进行直接对抗的代价。因此，中国必须接受并适应既有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中国如果要进一步提升国家实力与国际影响力，不可避免地会触及西方国家的既得利益，同时与其他新兴大国形成竞争关系，并且引起中小国家的疑惧。因此，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负责任的大国和强国，必须对新世界体系的构建提出自己的观点，而不能局限于对陷入结构性危机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技术上的修补。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必须通过和平手段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国际新秩序。无论是作为世界帝国，还是处于民族国家体系，像中国这种建立在具有多元族群和文化的超大经济社会基础之上的超大国家，都自成一个世界体系。这决定了它难以学习西方世界的历史经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优等生”。也就是说，中国要成功改革当前不可持续的国内政治经济结构，从而摆脱根深蒂固的国家脆弱性的束缚，最终必须依托于一个新的世界体系。“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具有世界体系构建意义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战略。

如前所述，由于具有强大的自给自足能力，美国和苏联这样的超大规模的现代国家的崛起，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变迁创造了新的结构性因素。中

^① Odd Arne Westad, *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p. 467.

国亦如此。从大国兴衰的角度来看，苏联兴亡、美国称霸和中国崛起共同构成了 20 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变迁的主线。这三个国家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现代版的世界帝国。二战后，随着非西方世界逐渐被现代民族与主权的政治边界“保护”起来，利用殖民战争开辟资本积累空间和创造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的大国竞争方式的有效性与合法性都被极大地削弱了。因此，通过国内发展的“示范效应”或政治军事干涉使国内治理方式在体系层次社会化，成为新的大国竞争方式。与欧洲霸权相比，美国霸权的一个新特征在于，“不能提供公平的国民福利的国内体制会削弱霸权”。^①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认为，美国和苏联的意识形态都是“民族主义化的普世主义”。^②冷战时期，美国、苏联和中国在第三世界的竞争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产物。正如文安立所言，“冷战最重要的方面既非军事亦非战略，而且也不是以欧洲为中心，而是它与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相关联的方面”。^③也就是说，第三世界国家国内治理的成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这些超大国主导世界秩序的合法性，甚至它们国内政治的合法性。

冷战结束以来，大国之间的国内治理方式的竞争实际上更加激烈，并且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美国虽然赢得了冷战，但其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却日益加剧，国内治理方式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而中国的复兴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华盛顿共识”的合法性。^④当前，中美竞争越来越表现

① 韩德：《美利坚独步天下：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马荣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中文版序言第 4 页。

②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63~365 页。

③ 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2 年版，中文版序言第 3 页、正文第 408 页。

④ 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指出，“美国梦”是美国最核心的竞争力，但只要中国按照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并且不出现大的经济或社会危机，其政治体制和现代化经验就会成为“美国梦”的主要竞争对手。参见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洪漫等译，新华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5 页。对这一问题更为深入的分析，参见胡鞍钢：《美国为何衰落》，载《学术界》2014 年第 5 期，第 5~13 页；赵可金：《民主的困惑：全球化时代的美国政治逻辑》，载《美国研究》2015 年第 1 期，第 34~53 页。

为各自国内发展模式的竞争,^① 以及各自主导的国际制度的竞争。^② 不难发现, 这些国际制度或多或少地带有各自国内治理方式的特征。例如,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 简称亚投行)强调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制造能力对全球经济复苏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 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一种拓展。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则强调贸易自由、知识产权和信息透明度的重要性, 有鲜明的美国特色。因此, 国际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通过国内治理方式在体系层次的社会化来消除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的一种尝试。

事实上, 中国经济社会与亚洲世界体系具有相似的结构, 发展不平衡是二者的共同特征。因此, 我们可以假设, 中国治理自身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经验能够在整个亚洲世界体系内进行推广。当前,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在全球资本积累中的等级地位明显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 后者的发展依附于前者的发展。也就是说, 中国的次国家结构在经济领域分别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同等级, 它自身就是一个小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 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 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 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③ “一带一路”倡议以“丝绸之路”这个世界帝国时代的全球化遗产为切入点, 旨在将中国的内部变革与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整合起来, 构建“命运共同体”, 这顺应了中国经济社会与亚洲世界体系变迁的长时段历史规律。例如, 作为亚洲世界体系长时段历史变迁的产物, 海外华人资本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成为了“帮助外资与中国劳动力、企业家和政府官员见面的‘媒人’……这种联盟比向美国、欧洲和日本公司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成功得多”。^④ 因此, 中国拥有了一种超越国家边界的市场经济资源。跨国性的华侨华人社会不仅是一种经济资

① 王缉思认为, “决定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关键因素, 不在于两国的外交和相互认知, 而在于中美各自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王缉思编著:《大国关系》, 中信出版社 2015 年版, 序言第 VI 页。

② 贺凯将这一现象称为“制度制衡”(institutional balancing)。参见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③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新华网, 2015 年 3 月 28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3/28/c_1114793986.htm。

④ Giovanni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 351-352.

源，同时也有利于中国优秀的文化和发展经验在国际层次的社会化，从而有利于地区乃至全球治理体系的合理化。

中国如果要真正起到消除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作用，必须更加重视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传统，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积极意义。对于中国而言，亚洲市场经济的非资本主义传统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构建的历史遗产，客观上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扩大设置了底线。正因为如此，中国才能在冷战后期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狂潮之中，拒绝全盘接受新自由主义教条，从而依然保有一个相对强大的现代国家结构。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试图依赖廉价劳动力来巩固和扩大中国在全球资本积累中的优势是不可持续的，广大劳动者不能被毫无保障地抛向市场经济并且任由资本去支配。如果为了追求片面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放任政治权力与资本勾结，将会动摇社会主义政权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根基，从而强化中国的国家脆弱性。而且，如果这种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方式随着中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合作走向世界，那么一方面，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会越来越难以容忍中国的崛起，另一方面，在全球资本积累中处于边缘等级的发展中国家也会将中国视为与西方世界一样的剥削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缩小国内地区、城乡间发展差距的主要手段是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为国内资本与跨国资本创造了巨大的资本积累空间，而且起到了组织动员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人口，将地方发展战略整合到国家发展战略之中的作用。中西部内陆地区的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使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资本能够更快、更广地流向中西部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而且，在基础设施建设中，通过对人力和物力大规模的组织动员，中央政府增强了对各地区基层社会的政治整合能力。与毛泽东时代不同，改革开放以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并非服务于应对外部战争威胁和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目标，而更多的是顺应了中国经济社会自然生长，以及中国主动参与全球资本积累的必然要求。因此，尽管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金融压力，但最终受益的还是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

“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这不仅能够满足中国消除国内发展不平衡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现实需求，也能够促进亚洲国家在地区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脱节的情况下开辟新的合作空间。通过基础设施建

设的“互联互通”来实现其他领域的“互联互通”，使中国广阔的内陆腹地的发展能够同西亚、中亚和东南亚等地缘政治经济破碎带的发展整合起来。这不仅有助于激发中国内部和亚洲世界体系潜在的经济活力，也有助于防止经济发展不平衡引发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危机。为了推进大规模的跨国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必须主导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那种服务于霸权更替的国际金融制度，这种制度必须能够防止金融资本蜕变为专注于投机食利、掠夺实体经济与基层社会，进而在国内层次和国际层次制造等级秩序的消极力量。这也是将中国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关键。亚投行的成立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但是，我们不能将亚投行乃至“一带一路”倡议庸俗化为大型的投资和经济援助项目，构建新型世界体系才是其最终目标。

在霸权秩序以及霸权更替机制本身逐渐失去有效性与合法性的情况下，构建新型世界体系应当以去等级化为原则，但这不可避免地会触及西方国家的既得利益，进而有引发国际冲突的风险。而且，强调“互联互通”也很可能激发中小国家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因此，中国为了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而发起或主导的国际制度与国际组织，一方面必须有针对性地确保最不发达国家和最底层的社会群体成为最主要的受益者。正如汪晖所言，“现代国际主义的传统需要被重新提出来——不是那种输出革命式的国际主义，而是真诚关心和尊重第三世界国家的生存、发展和社会权利，在全球范围内探索一条平等、民主和共同发展的道路”。^①另一方面，也应当充分考虑并协调各大国现实的势力范围与利益关切，^②以及沿线中小国家执政精英的派系分化和现实需求。^③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各个地区的历史遗产，以及各个国家成功的治理与发展经验及其在国际层次上的社会化对

① 汪晖：《中国崛起的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载《文化纵横》2010年第2期，第35页。

② 有学者认为，大国协调是推进国际安全治理，尤其是东亚地区安全治理较为现实的路径。参见郑先武：《大国协调与国际安全治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5期，第49～65页；郑先武：《东亚“大国协调”：构建基础与路径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5期，第88～113页。

③ 在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周边国家的国内政治斗争对其对华政策的影响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然而，国内学界对此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这也折射出国别和区域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目前对于这一问题比较有启发性的研究有：查雯：《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变背后的国内政治因素》，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5期，第120～139页；周方治：《“一带一路”建设政治环境评估的思路与方法——基于泰国与印度尼西亚的案例分析》，载《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66～77页。

于构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意义。有学者指出，“我们讨论‘一带一路’、亚投行等议题时，需要集中关注的，恰恰是新兴经济内部的‘国家—市场—社会’复合体的性质，是如何在区域治理和世界秩序层面得以‘外部化’的”。^①总之，“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将国内发展改革和国际秩序变革有机统一起来的产物，它试图通过创造国际需求，解决国内产能过剩问题，促进经济转型，并且提升中国对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尤其是经济治理体系构建的影响力。因此，“一带一路”倡议集中反映了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世界秩序观，从而为构建更具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新型世界体系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案。

五、结 语

冷战的结束并非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的重新开始。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陷入结构性危机，而我们又难以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从而缺乏对新世界体系的想象力的今天，重新思考长时段的历史变迁以及非西方世界的历史经验无疑是有益的。

从民族国家体系取代世界帝国，再到世界帝国以民族国家的形式重现，最终又呼唤一个去等级化的世界，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似乎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亚洲秩序的变迁和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则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缩影。无论在前现代世界，还是在现代世界，甚至在后现代世界，中国都能够通过主动或被动的内部变革引起体系层次的结构性的变迁。这否定了国家只能在体系压力下被动调整自身的行为，而无法改变体系本身，从而证明了“体系”与“单元”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将国家行为归因于抽象的体系模型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无益于指导实践。尤其是按照西方历史经验下的权力转移与霸权更替理论，中国作为崛起国，在国家实力与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尚有较大差距的情况下，选择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参与新世界秩序构建，无疑是一种透支国力的非理性行为，而且“一带一路”倡议本身的前景也是黯淡的。然而，从另一视角来看，在既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身已经出现结构性危机的情况下，谁能够率先将自身的发展与新世界体系的构建结合在一起，进而发展出新的生产方式与政治结构形式，谁就能获得真正的权

^① 张昕：《国家资本主义兴起视野中的“一带一路”》，载《文化纵横》2015年第3期，第31页。

力优势地位。也就是说，中国长远的发展机遇不是等来的，而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出来。这是因为，同样是按照西方历史经验下的权力转移与霸权更替理论，作为既得利益者的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不可能继续容忍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自然而然地达到权力转移与霸权更替的“临界点”。

当今中国的发展既受制于又得益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中国重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既导致了全球性的权力转移，也加剧了全球性的权力分裂，从而为这一体系的未来增加了不确定因素。不确定性未必意味着危机，也可能孕育着新的希望。作为相对独立的世界体系，中国和亚洲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崛起既是学习新的社会化经验的结果，也得益于对历史遗产的继承。“一带一路”倡议试图将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整合起来，是中国从“韬光养晦”和“独善其身”到“有所作为”和“兼济天下”的转折点，它带给世界的不是，也不应当是又一次的霸权更替。新的实践经验催生新的理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应当，也能够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迁中发展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不仅有利于解释和指导中国自身的实践，而且中国经验所蕴含的一般性的理论逻辑，也将为全球范围的国际关系研究和实践带来新的活力。这实际上也是批判西方中心主义，以及中国这样自成一体的超大国家参与新世界秩序构建的应有之义。

Abstract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midst the Structural Crisis within the Capitalist World-System: Considerations Based on the Evolving Asian Order and China's Modern State Building Experience

Fu Yuheng and Li Yiping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 contradiction has emerged between the unlimited accumulation of global capital and the limited sovereignty of the nation-state, and it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for hegemonic leadership to deliver opportunities for high profit / low cost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This is what is referred to as the structural crisis of the capitalist world-system, and in Asia has manifested itself in terms of the disconnect that has emerged between economic and security institutions, or what we refer to as the “Asia Paradox”. The historical legacies of world-empire and its unique experience of modern state building have placed Asia in a position to play a key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future evolut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system. China is a mega-state which is built on the foundation of a culturally diverse socio-economic system of massive proportions, and regardless of whether we consider its pre-capitalist or capitalist era, China is much more than an abstract political actor, and has largely existed as a self-contained and independent world-system. This presents China with the great state capacity to influence change in the world-system through its internal reform processes, but also shapes China's own deep-rooted national vulnerability. China's modern state building process has essentially consisted of the reconstitution of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 Should China desire to resolve the issue of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it faces between the imbalance in it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lack of governance capability, and thereby liberate itself from the restraints it faces vis-à-vis national vulnerability, it must rely on a new world-system, and it must not be confined to simply making technical adjustments to the capitalist world-system that has fallen into structural crisi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presents a Chinese modern state building strategy with implications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world-system. It attempts to integrate China's internal reforms wit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eds of Asia or even the entire

globe, and ultimately introduces the possibility of a change in the system away from hegemony.

Key Words: Structural Crisis in the Capitalist World-System; World-Empire; “Asia Paradox”; China’s Modern State Build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bout the Authors: Fu Yuheng is a PhD Student in the Research School for Southeast Asia Studies at Xiamen University and a Visiting Scholar at the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Li Yipi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Research School for Southeast Asia Studies at Xiamen University / Center for Studies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Southeast Asia

Major Differences in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Ways of Thinking and their Implications on “A New Type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 S.”

Pan Zhongqi

Abstract: Differences in the way of thinking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people are implicative on the building of “a New Type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They are critical to understand what major disputes might exis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 S. and how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solve them. Chinese and Americans follow very different ways of thinking. By contrast, Chinese prefer a dialectic, relational, organic and outside-in way of thinking, while Americans favor a logical, generic, mechanical and inside-out way of thinking. Those differences in the way of thinking to some extent mak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wo very different play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Sinc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 S. involves not only their divergent ways of actions, but also their contrasting ways of thinking,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two sides, in their efforts of building a New Type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to pay closer attention to their different ways of thinking, to have mutual empathy from another side’s perspective when interpreting its strategic behaviors, and to build up increasingly their mutual strategic trust.

Key Words: Chinese; American; Way of Thinking; “A New Type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 S.”

About the Author: Pan Zhongqi is a Professor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at Fudan University